



大学校长 主体性发展论

王飞◎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教育家办学语境下的
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与构建”（项目批准号：13YJC880063）的研究成果
本书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大学校长 主体性发展论

王飞◎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论 / 王飞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7

ISBN 978 - 7 - 01 - 013481 - 9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高等学校—校长—学校管理—研究

IV. ①G647.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9302 号



作 者

王 飞

责任编辑

苏向平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 编

100706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13481 - 9

定 价

52.0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卓越大学校长的问题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相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有了大大提升,而且已经从自发的样态演变为自觉的样态。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生开始自觉地以大学校长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力图从多维的角度来理解大学校长。在这方面,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因为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对大学校长的职业发展与成长问题进行了把握,才有了当代大学校长的研究热潮。王飞博士的《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论》就是以“主体性”为切入点来审视大学校长卓越性的。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切入点,王飞以自己深入的探讨研究,拓展了对卓越大学校长的哲学理解,提供了对大学校长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如果把大学校长比喻为一枚硬币,那其超越性与卓越性就是这枚硬币的两面。离开超越性谈大学校长的卓越性,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认知;而离开卓越性来谈大学校长的超越性,只能是脱离大学发展实践的、没有现实基础的、神秘的外在力量。必须把二者看作一个问题的两面,并且将其内在地统一起来,才能为研究找到基本的立足点。但是仅找到这个立足点是不够的,还必须找出一个切入点作为突破口,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我们知道,当大学的价值被提升到日益重要的地位之时,作为推动大学发展主体的大学校长,不论他是否意识到,客观上其作用早已社会化,大学校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志。大学校长作用的充分发挥已成为今天大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需。一言以蔽之,一部大学发展史和社会的变迁已将大学校长推到了这样一个地位:大学校长是具有相当程度的专业技术水平和领导管理能力并以各种方式关心、关注和影响着大学发展的主要人物。大学校长之所以是这种主要人物,从根本上他是大学精神的生产者,退一步说,至少大学校长是大学精神的助推者。这是因为大学校长不满足自身引领的大学既有的一切,而是力图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超越当下已有的样态,将这种超越意识、超越能力自觉地凝聚为主体意识,大学校长的主体意识又在这种超越能力的实现中彰显出来。大学发展

实践活动是大学校长的主体性的集中展现,或者说他本身就是具有主体性的。具有主体性的大学校长创造了大学的主体发展,使大学成为独立、自由的学术共同体。在大学校长从大学共同体中彰显出其主体地位以后,大学校长的领导管理实践活动就是在自己创造的大学共同体中进行的。大学共同体由于大学校长的主体活动而被“主体化”,成为社会诸多主体元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校长作为一个有价值意义的主体符号,历史地推动了和现实地影响着大学共同体的发展。借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校长的主体性正是其超越性与卓越性的体现,进而以主体性为切入点来检视大学校长和大学发展就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了。

围绕上述这个切入点,《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论》一书从锻造卓越教育家的时代命题的视角来论证大学校长的主体性生成模式,检视大学校长的卓越性依据。对卓越大学校长生成的探求决定了该研究的逻辑具体体现为大学校长主体性的本质和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异化以及大学校长主体性生成的对策。总体来说,王飞博士的研究比较深入,许多问题的提出和阐释颇为独到,文笔犀利,词旨剀切,有助于大学校长研究的深化。主体性作为揭示大学校长卓越性与超越性的内在本性,在理论上比单纯地直接去把握“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概念更抽象,因而更难以把握。王飞不畏艰险,刻苦钻研,勇于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然,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在驾驭重大学术理论问题上经验还稍显薄弱,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为自己所用方面还稍显欠缺,对一些问题的探讨也还时有锋芒逼人的执着。作为王飞博士的指导教师,我对他的为人与学养是比较了解的。学术无王者之路。相信经过自身的努力、实践的历练和学界同仁的帮衬,王飞在学术的道路上会走得更稳、更快、更远。

是为序。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王运来

本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主体性视角切入有其新意。分析框架合理,有助于主旨的阐释和论证。资料丰富,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得当。观点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田正平教授

本书结构清晰,论证充分,行文通畅。所提出的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一些观点,如学场主体性等对我们深入分析大学校长与大学办学之间的关系,认识大学校长的作用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胡建华教授

该研究具有新颖性与现实针对性,文献资料丰富,研究全面,具有现实批判性,开辟了大学校长发展的新思路。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许庆豫教授

该研究拓宽了对大学校长研究的视角,充实了大学校长研究的理论,开辟了大学校长发展的新思路,提升了大学校长的主体意识,能够引发当代大学校长的反思。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汪霞教授

该研究有价值,资料翔实,思辨性强,对问题的讨论广泛而深入,具有较强的学理性。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余秀兰教授

该研究立足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前沿热点,选题新颖,研究系统而深入,丰富了大学校长研究的理论,开辟了大学校长研究的新视野。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操太圣教授

目 录

Copyright ©

导论 主体性发展的视角	1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切入视角	2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12
第三节 研究现状暨文献综述	14
第四节 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	23
第五节 研究思路和逻辑架构	38
第一章 应然论:主体性发展的本质	39
第一节 大学校长及其职业渊源	40
第二节 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内涵体系	67
第三节 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国外镜鉴	89
第四节 近代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本土追索	109
第五节 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基本表现及发挥	163
第二章 实然论:主体性发展的问题	185
第一节 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异化	186
第二节 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异化的危害	197
第三节 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异化的诊断	201

第三章 本然论：主体性发展的建构	258
第一节 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基础	259
第二节 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价值	282
第三节 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路径	298
结语 主体性发展的本相	348
第一节 对大校长主体性发展研究的一点再思量	348
第二节 对大校长主体性发展研究的个人价值观	349
附录	357
附录 1 大学校长主体性对办学治校重要程度的评估问卷	357
附录 2 调查对象一览表	359
附录 3 大学校长主体形象他者认知访谈问题	360
主要参考文献	361
后记	371

导论 主体性发展的视角

进入 21 世纪以来,从诸多视角对助推高等教育强国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战略进程的研究日渐增多。其中,大学校长作为一个现代大学制度结构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瞩目。在历史上大学校长虽然一直作为引领大学发展的卓越性符号而存在,但由于相关研究和理论的偏颇,加之行政化办学体制局限性的影响,从主体性视野对大学校长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并没有引起必要的关注,导致对卓越性大学校长发展的问题还有认识上的不深入与实践上的某些模糊。如果不彻底改变沿袭已久的大学校长官场化运作模式,如果不能提供新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教育家办学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将会是一席空谈,更不能真正落实。恰值当代中国大力倡导教育家办学,大力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之时,在这个历史的交会点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都要求我们“从主体性角度对卓越性大学校长是为何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大学校长的”这个重大而持久的问题进行深入与系统的研究。大学校长的主体属性,是指大学校长作为办学治校主体而具有的本质特性。也就是大学校长在办学治校中所表现出来的与大学组织特性相吻合甚至超越于大学特性的、符合其职业特点与发展规律的、那些与大学校长职业本身密不可分的性状总和。这表明,大学校长是一支具有法定性、社会性、专业性(学术性)、专门性(职业化)、独立性(自由性)、自律性与自治性的,且被国家、政府、社会与大学组织所认同的独立职业力量。当代中国大学校长在其职业活动中是否有这种走向卓越的主体属性?如果没有,大学校长主体性在当代中国到底怎么了?它是否发生了异化?若是,它又有哪些表现?由什么原因造成?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进程中倡导教育家办学,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切入视角

一、问题提出

马克思说：“在所有的科学中，研究的初始阶段都十分困难。”尤其是清晰地选择一个“须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①就更为困难。伴随这种研究初始的困难，笔者小心翼翼地对斑驳迷人的大学校长发展现象进行问题捕获与析疑，进而聚焦于透过“主体性”折射大学校长卓越性发展的特性，找到大学校长卓越性发展的基因和破解大学校长发展现象的密码，这是解答大学校长是否能卓越发展的钥匙。认真疏解弯曲而螺旋式前进的问题认知心迹，可解析出“实然问题—本然问题—应然问题”三位一体的问题格局。

（一）实然问题：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异化

实然问题是从“事实性层面”揭示大学校长主体性处于什么状态，也就是在“客观性”层面揭示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落点。回顾一下新中国的大学发展史就可看出，中国大学是在一种极端震荡化的方式中步入“被行政化”^②困境的，是在震荡化与被行政化中从精英化阶段步入大众化阶段的。“震荡化”即指促使事物发展的力量太猛、太权力化，而使“中国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实验场’局面相当混乱”^③。从1952年的院系调整^④开始，新中国的大学就步入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367页。

^②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先生说：“目前大学行政化的问题最主要的不是大学内部的行政化，而是政府。直白一点说，中国大学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是‘被行政化’。大学的‘被行政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大学内部，使大学内部行政化。”参见袁振国：《高端访谈——关于现代大学的思考》，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4页。转引自王春春：《如何探索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访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大学》（学术版）2011年第5期。

^③ 陈平原：《解读当代中国大学》，《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④ “院系调整是新的人民政府要对旧世界的所一切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的指导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这样就把教育不加分析地与政治等同起来，把一些纯学术方面的问题纳入了政治思想范畴。”（参见陈远：《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页。）院系调整的本质是把国民政府时期的欧美大学体制全盘改成苏联体制，是对国民政府时期那一批大学校长兢兢业业建立起来的欧美大学体制的全盘否定。院系调整后中国大学体现出三个特征：“观念层面：教育完整体现政党意识形态；制度层面：公立大学的绝对垄断地位；操作层面：长期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参见谢泳：《中国大学的两个传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2年第6期。

了极端震荡之中,之后是“文革”的震荡导致中国大学的制度异化与文化迷失,再到后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大学教育,1999年之后过快过猛的“高校大跃进”^①更是加速了高校行政化过程,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这种震荡化状态是因为“政府部门超强控制”^②而产生的,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当代大学已经失去了大学的本真意义,大学正在失去自我”^③,“大学被迫蜕变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内准官僚名利场”^④。在这种震荡化的实然状态下,大学校长作为办大学与治大学最重要的实践主体,作为大学制度变迁与大学发展的重要微观主体,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最重要又是最稀缺的人力资本,竟然“是被‘创造’的,许多人是在‘懵懵懂懂’状态下出任大学校长的”^⑤,这样的体制导致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异化,导致其主体性发展陷入了困境。

具体来看,一是大学的被行政化导致大学校长的主体性异化。有学者指出:

大学被行政化助长了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将本应圣洁的学术殿堂变成了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官场,使千千万万的年轻学子弃学入仕、走向歧途;大学被行政化使长官意志成为圣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政绩工程泛滥,使中国大学质量与国外先进大学的差距日益拉大。^⑥

并且“大学校长领导作用的发挥必须受制于上级主管部门和校内党委集体领导。因此,在这种体制下大学校长处于一种典型的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之中”^⑦。在这样的体制下,大学校长的办学难以是独立的、自觉的、自为的,难以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即使有了理念也难以将理念转化为实践。诚如潘懋元先生所言:

这样的体制下面,我们的校长能干什么呢?只能在繁琐的规定中,在一个桌面跳舞,只能够在桌面上跳得好一点或者跳得差一点,你没办法去

^① “始于1999年的中国高校‘大跃进’……各种高等教育工程、高校合并,为了弥补规模扩张造成资金短缺,大学学费的猛涨、高校大规模借贷……这些‘大跃进’式的扩张……”(参见张鸣:《中国教育病了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3页。)

^② 吴康宁:《政府部门超强控制:制约教育改革深入推进的一个要害性问题》,《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5期。

^③ 董云川:《论中国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④ 孙华:《大学之合法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

^⑤ 王洪才:《大学校长:使命·角色·选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自序。

^⑥ 王炯华:《朱九思评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180页。

^⑦ 陈运超:《论大学校长治校的基本矛盾之一:领导与被领导》,《现代大学教育》2007年第4期。

地板上跳。这样,校长还能有创造性,还能办出有特色的大学吗?^①

借此,大学校长难以获得真正的作为教育家的主体性,仅仅是官场中的一个成员而已;二是大学管理的复杂性印证了当代大校长主体性的异化状态。“大学是非常复杂的,哪怕最老到的大学管理者,也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开始对其有所认识。”^②大学管理不同于经济管理、企业管理与军事管理,它的直接任务是为大学的核心任务——“教书育人”和为“致学位以高深”的发展服务。“如何处理好‘学问’与‘管理’的关系,是中国大学发展长期以来的‘瓶颈’问题”^③。做学问就是寻求“知识真理”、探索事物发展的“原理”与“道理”,大学管理最根本的规律首先在于尊重这个“理”字,寻求这个“理”是第一位的、压倒一切的,大学里的其他东西必须为这个“理”让位。在尊重这个“理”的前提下才是为“理”服务的“管”,即由以大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团队对大量的日常性、落实性的行政事务与学术事务进行处理与管理,诸如会议安排、后勤保障、图书设备、人才培养、科学的研究等。加之在学者云集之地的大学,学者权力观念、等级意识相对淡薄,他们往往既不令,也不从。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指出:

大学教师是世界上最独立的人,他们完全投入他们的研究领域,致力于学术价值。他们的言论完全自由,可以无所顾忌地向校长表述他们的观点。所以,校长必须动员这些教师以及协调学生和员工,才能办成一件事。^④

在大学以外的领域可能领导一句话就能办成的事情,在大学领域中费很多口舌也未必能办成,在大学中经常过剩的产品就是“主意”。主意太多,各抒己见,很难达成共识。许多问题都需要经过反反复复的磋商才能达成决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的现象在大学领域是屡见不鲜的。这一切复杂的管理现象决定了大校长管理大学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导致大校长的问题“既是教育问题,又是文化问题和政治问题,是牵扯国家教育基本观念、教育领

^① 潘懋元:《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潘懋元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② [美]詹姆斯·J.杜德施达特:《舵手的视界——在变革时代领导美国大学》,郑旭东译,桑新民校,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③ 叶隽:《大学的精神尺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④ 《杨澜访谈录·访谈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http://v.youku.com/v_show/ld_xmtusmjeymdaw.html。

导体制、大学基本制度等许多方面内容的复杂性问题”^①。这就要求大学校长要具有较高的主体性智慧、主体性能力、主体性地位,具有一种尊重思想自由,勇于发扬民主而又善于集中意志的主体性智慧能力。

在任何一所著名的大学,其历史上都曾有一位或多位有权威、有影响力校长……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与政治体制之下,大学的繁荣或衰退都取决于大学校长的能力。^②

而当代中国大学管理复杂性状态的解决似乎与校长没有多大关系,反而与政府的管理体制关系甚密,大学的繁荣或衰退取决于政府,不取决于大学校长的能力,作为办学治校主体的大学校长往往习惯于政府既有的制度安排,无法超越现有的制度架构。因此,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异化是明显的。就像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指出的那样:

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大学痛苦而无奈地步入了追名逐利与失魂落魄的快车道。大学如何在异化的社会文化土壤中,让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成长为有理想追求、有道德责任感、有民族自尊心和全球化视野的 21 世纪世界公民?^③

这是践行教育家办学命题时代里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办学治校活动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二) 应然问题: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本质

应然问题是从“价值性层面”阐明大学校长主体性“应当是什么”或“怎么样”,也就是在“主观性”层面树立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方向。“校长的领导是学校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最具影响力的要素。”^④从中外大学发展中可知,教育家型大学校长引领着大学嵌入国家与民族发展中,大学成为民族与社会发展的一把不会熄灭的火炬,照耀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社会现实生活的苦难与悲欢。而大学校长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引领这种方向的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① 王长乐:《大学校长现象形成的复杂性原因》,《现代大学教育》2008 年第 2 期。

^② Cowley, W. H., *Presidents, Professors, and Trustees: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academic government*, San Francisco: Joeeyy - Bass, 1980.

^③ 引自陈骏校长在南京大学 110 周年校庆庆祝大会上的讲话,2012 年 5 月 20 日笔者在庆祝大会现场的记录。

^④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Ten Good schools: A secondary School Enquiry*, London: H. M. stationary Off, 1977. 转引自[挪威]波·达林:《理论与战略:国际视野中的学校发展》,范国睿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2 页。

从历史上看,作为学校的最高行政长官,大学校长是学校的灵魂,即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的成功创建、平稳运行、革故鼎新、进步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①

中外大学发展史上那些卓越的大学校长,他们把所有的心力都用于对大学主体性的追求与探索上,大学在改造国民性和改造社会中都起到了直接的作用,进而使自己的主体性在历史生成中走向了卓越。可见,大学在宏观上虽然是国家的大学,但国家本身是个虚拟的办学主体,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大学运转中,大学是由一批知识分子引领着一批批准知识分子为国家这个虚拟主体与社会进行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与知识再生产的共同体,国家这个虚拟主体把办学权与治校权赋予大学校长主体,由大学校长主体来履行办学治校权。当办学治校权由国家履行时,国家作为大学产权拥有者的身份就与其作为办学治校者的身份搅和在了一起,扰乱了大学特有的秩序,这就要求赋予大学校长这个与利益冲突无涉的办学治校主体,以吻合大学追求真理的特性的主体性权力,彰显其主体性效能,主体性地居于代表国家的党务系统与代表知识的学术共同体之外独立办学治校。在保证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大学制度中,切实保证大学校长主体性地办学治校,即大学校长在大学职能施展和对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彰显“学场主体性”,既不受办学虚拟主体的政府的政治支配,也不受大学内部作为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共同体的控制,更不能成为大学内外某一势力或某一学科流派的附庸。大学校长主体性地办学治校是对其成为独立办学者与治校者个体地位与态度的诉求。大学校长作为办学治校者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应该以一个有“学场主体性”的、独立的、化解学术与政治冲突的裁判者的职业形象呈现。据此才说大学校长是办学治校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因此,大学校长发展的应然状态应是成为“充满学场主体性的职业教育家”。因为:

在任何一所学校,无论从哪方面看,校长都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人。他或她是对校园内外所发生的所有活动负责的人。是校长的领导框定了学校的格调、教学的风气、专业化的水平、教师的士气以及学生能够或不能够成为什么样子的关注程度。^②

^① 王英杰、刘宝存:《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② [美]Robert J. Marzano等:《学校领导与学生成就——从研究到效果》,邬志辉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基于此,近些年围绕“教育家型大学校长”发展的应然状态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个“真问题”^①,也是当代中国“真实的教育现象”^②,其研究已真正走进教育视界,在国家层面、大学层面与相关学界中越来越受瞩目,关于大学校长的职业与地位不仅吸引了众多学者埋首研究,而且也给高等教育这个文化市场创造了一个卖点,“教育家办学”^③、“卓越大学校长”等命题纷纷呈现,俨然造成了一股大学校长研究热的滚滚激流。在某种角度上看,“教育家办学”、“卓越大学校长”这些命题可以说是高等教育大国时代里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波及大学发展的一个结果,是对大学校长主体性异化和教育家型大学校长阙如时代的一种回应,是对大学校长主体性理想状态的追求。大学在信息、全球化经济时代所占据的节点区位使其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或某一区位的文化与知识中心,而在大学日益发展的同时,中国大学校长却在无可避免地深深陷入一种没有大学校长所应具有的主体性状态之境地。这不仅使大学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而且使大学与其作为一个国家与民族最高精神文化机构之间的距离也在逐渐拉大,这种结构性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我们改革传统的大学被行政化管理体制的架构,并寻觅一个能够培育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有效的思考单位,即描绘出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理想状态。这是求解问题的方向。

(三)本然问题: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的建构

本然问题是从“建构性层面”说清在大学校长主体性的发展上必须“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如何处理“事实性层面问题”和“价值性层面问题”的关系问题。正如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在其著作《本然的观点》里所指出的:

① 南京师范大学吴康宁教授指出:“‘真问题’指的是教育理论的发展或教育实践的改善迫切需要去解释与解决,且研究者本人也有研究欲望与研究热情的问题。”(参见吴康宁:《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教育研究》2002年第11期。)笔者认为,大学校长职业发展问题是贯穿于一个大学全部历史并且推动着大学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大学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释与解决的问题。

② “真实的教育现象”的说法是北京大学陈学飞教授于2011年10月29日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研究院主办的“多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博士生交叉学科创新论坛上作的“谈谈高等教育领域博士生的创新问题”报告中提出来的,意指博士生该如何做研究,其原话为:“尽量研究中国真实的教育现象,提出有解释力的概念与理论。”

③ 所谓教育家是指深谙教育规律并在尊重教育规律之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理想,并在实践上有创见、有贡献与有影响力超出一般的杰出而卓越的人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第四部分“保障措施”的第十七章“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中说:“倡导教育家办学。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

如何处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关系问题,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客观性。客观性无法对世界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解决的方法不是禁止客观化。而是求得客观性与不可还原的主观性的协调,即以本然的观点看世界。^①

中国学者也持与托马斯·内格尔类似的观点,如祁洞之教授说:

……实然与应然的关系。在希腊哲学直至笛卡尔时期,两者关系是水乳交融的:通过一个至上的本体(Noumena),在“我思故我在”的圆融体系之内,形成一种等式化的提升、传递关系:实然一本体一应然。……在中国哲学乃至在整个中国思想领域,事实系统与价值系统从来没有处于被割裂的状态,实然与应然之间有很好的观念过渡,那就是本然系统的存在。在实然一本然一应然的关系当中,“本然”一端挑起事实系统的关系范畴,另一端挑起价值系统的关系范畴,自身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范畴。^②

据此,笔者认为,如何处理好事实系统与价值系统的关系,关键在于尽量求得两者的协调,也就是尽量使事实性问题与价值性问题协调,这就只能以本然的观点来处理问题,即在规范性层面上建构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路径。显然,在厘清了大校长主体性发展的实然问题与应然问题后,不能忽视作为“集结点”的“本然问题”,也就是千方百计地构建一套能够使大校长主体性发展的理想状态得以实现的系统路径,这套有效的系统路径便是连接大校长主体性的实然问题向应然问题转化超越的本体力量。构建起这套系统路径,相信就能实现实然问题向应然问题的转化与超越。寻找并构建这套有效路径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只有不断纠错,才能使大校长不断地接近其“学场主体性”的本然状态。诚如波普尔所言:“历史没有宿命,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运用自己的有限理性不断地纠错。”^③不断地纠错亦就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大校长主体性实现转化超越的灵魂。制度建设恰当而稳定,大校长主体性便能走向健康且卓越;制度建设缺失而动摇,大校长主体性便会走向异化且退化;制度建设无力而松垮,大校长主体性便会走向腐化且堕化。制度建设包含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与微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旨在能真正促使大校长实现其主体性的转化或超越,还原大校长职业的本来面貌——

^① [美]托马斯·内格尔:《本然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内容简介。

^② 祁洞之:《本然论》,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96页。

^③ 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页。

获得“学场主体性”。这一本来面貌的实现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大学有效发展,推进一流大学建设战略有效实施。因此,站在本然立场解释实然问题向应然问题的转化与超越,不会遭遇牵强附会的尴尬,而是符合逻辑学理的探索。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问题预示着求解问题的方向并规定了可能获得的答案。”^①他说到的前一个“问题”即实然问题,“求解问题的方向”即应然问题,“规定了可能获得的答案”即连接实然问题与应然问题的本然问题。

二、切入视角

之所以选择“主体性发展”视角作为大学校长发展问题的切入点,基于以下考虑:大学校长作为一个现代大学制度结构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瞩目。大学校长作为一所大学发展的代表性观测点,其卓越性发展是一个与大学的生存状态相关联的根本问题,直接关系到大学变革的动力与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的发展不是大学校长“治理”出来的,而是大学校长的“影响”造就的,“治理”只是任职的几年时间,而具有吻合其职业特性的主体性力量产生的“影响”是永久的。以“大学校长主体性”作为考察其卓越发展的一个统摄点,来检视大学校长发展的职业化进程,是具体有微而又能体现发展轨迹的,是相当典型的,并容易说明全局性的问题和历史进程。

(一) 主体性发展关乎大学校长的卓越发展

前面提到,主体性之于大学校长的职业发展是一个真问题。大学校长问题的提出折射着我们对于大学校长职业发展的新认知。“教育家办学”、“卓越大学校长”命题,也理应看作是对前述问题的一种知识反应或文化反应,抑或是制度反应。把这种反应居于理论性的高度归结为“大学校长主体性”范畴,不但可以巧妙地避开学界这些年那种传统的研究理路,而且可以巧妙地把教育家办学的问题置入不同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横向与纵向上的挖掘与比较,进而避开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所造成的障碍,而集中关注一些在教育家办学与卓越大学校长的职业发展上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高等教育大国时代里的“教育家办学”显然隐含有这一职业发展的追求趋向。把“大学校长职业发展”与“教育家办学”的命题放在“大学校长主体性”视角的统摄下进行关照,看看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究竟是怎样的?看看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究竟是如何演变的?看看当代中国大学校长主体性究竟怎么样?究竟如何

^① 汪丁丁:《串接的叙事:自由·秩序·知识》,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1页。